

银保监会：政策性金融债监管政策没有变化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针对近日的市场传言，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9月2日回复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有关政策性金融债的监管政策没有变化。

上述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银保监会持续整治金融市场乱象，推动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回归本源，规范同业业务发展，遏制金融脱实向虚。目前，城商行同业业务监管执行现行商业银行统一监管规定。对有关指标进行日常监测，属于非现场监管常规工作。有关政策性金

融债的监管政策没有变化。

银保监会日前通报的部分地方中小银行机构现场检查情况显示，同业业务治理不到位、经营不规范是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之一。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介绍，同业业务是传统信贷业务的必要补充，只要依法合规经营，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的金融产出，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前期一些银行的同业业务中，存在杠杆高、嵌套多、链条长、套利多等问题，不仅加大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而且带来金融风险的快速累积。

“自2017年监管层开启治理金融乱象工作以来，对同业业务的监管重点布局在负债端。”光大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一是将同业存单纳入MPA考核；二是在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约束同业负债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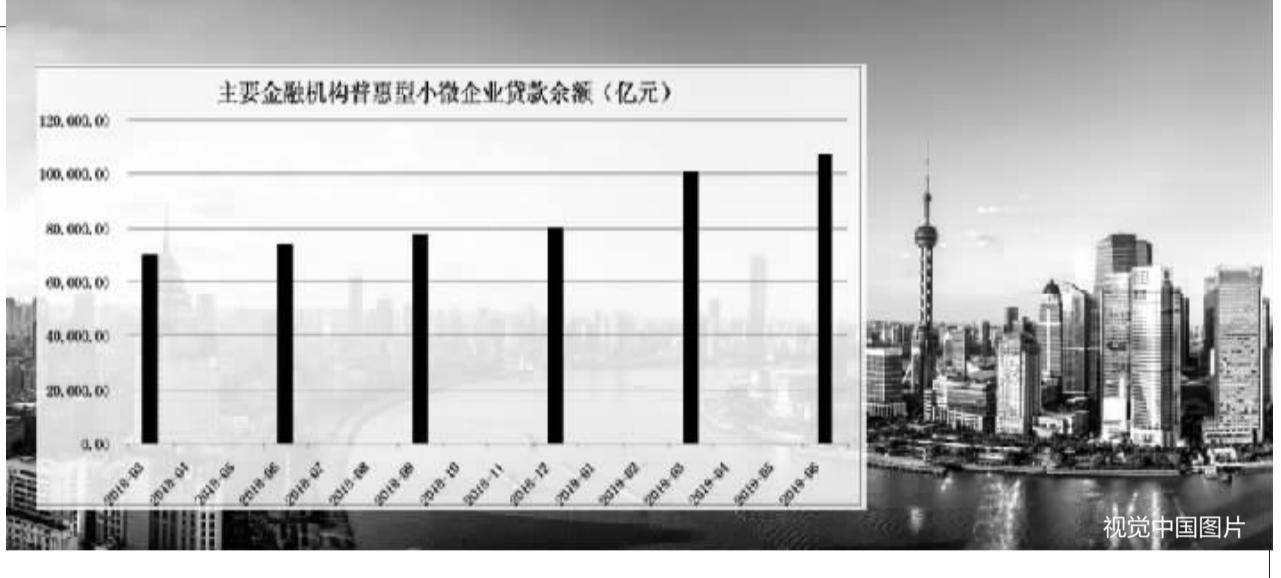
专家认为，在趋严的同业监管政策下，部分同业依赖度高的商业银行面临持续的调整压力。

张旭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同业业务应继续成为金融供给侧改革重点。预计同业业务中的一些过于激进、忽视交易对手和金融产品

风险的做法难以持续，银行同业业务生态将得到重塑，同业业务将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谈及商业银行如何应对，华创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周冠南认为，在银行负债端，商业银行需继续减少同业负债占比，增加存款等核心负债比重，考虑到目前银行获取核心负债多依赖结构性存款这类成本较高产品，因此，在调整负债结构过程中，部分银行可能受到成本上升或整体负债规模收缩的影响。在银行资产端，部分商业银行可能需要减少包含同业金融资产和特定目的载体在内的同业投资。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近日召开会议，研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等问题。专家认为，下阶段，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还有很大潜力。应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资本市场各项基础性制度，提升直接融资比重。



视觉中国图片

金融委“划重点”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将加码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通过新机制挖掘投资潜力

会议指出，充分挖掘投资需求潜力，探索建立投资项目激励机制，支持愿意干事创业、敢于担当、有较好发展潜力的地区和领域加快发展。高度重视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传统产业改造、社会服务等领域和新增长极地区的发展。鼓励银行利用更多创新型工具多渠道补充资本，真正落实尽职免责条款，有效调动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积极性，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全面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从稳增长角度看，下阶段，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还有很大潜力。投资在经济稳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在一些领域和地区，投资仍有很大潜力，要

通过新机制挖掘新的投资潜力。比如，从地区来说，当前有很多新的增长极，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等，金融机构可加大支持力度。

申万宏源证券宏观高级分析师秦泰表示，本次会议从项目导向出发，明确提出“充分挖掘投资需求潜力”，预计利好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进一步实施基建投资，先进制造业项目有望获得更多支持。

对全面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分析师王静文表示，对银行而言，要真正落实尽职免责条款，有效调动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积极性。对金融市场而言，要大力推动银行间市场直接融资，推动企业通过发行短期票据、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债以及区域集优集合票据等进

行直接融资，满足企业多元化需求，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间接融资体系，以多种融资方式协调发展，增加信贷供给总量。

提升直接融资比例

会议强调，要做好今后一段时期金融体制改革的整体谋划，进一步扩大开放，完善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体系的适配性。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坚持稳中求进，以科创板改革为突破口，加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完善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扎实培育各类机构投资者，为更多长期资金持续入市创造良好条件，构建良好市场生态，增强资本市场的活力、韧性和服务能力，使其真正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温彬表示，此次会议强调资本市场改革，突出以科创板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在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增加长期投资者比例等，最终会建立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使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到助推器作用。

对下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王静文认为，重点仍应是发展直接融资。目前，信贷在融资结构中占比为80%以上，股权融资不超过10%，债券市场基本是准信贷市场，债券品种单一且交易不够活跃。应以设立科创板为标志，完善资本市场各项基础性制度，增强资本市场的活力、韧性和服务能力，提升直接融资比重。

一线监管插上科技翅膀

□本报记者 孙翔峰 周松林

上交所9月2日消息，经过一年时间的研究探索，上交所自主研发的“公司画像”平台已正式上线试运行，成为科技赋能监管的有益实践。通过试水智能化监管，上交所为一线监管插上“科技翅膀”。

用科技手段给上市公司“画像”

上交所公司画像平台对沪市公司进行全貌监控和电子留档，以服务监管为出发点，主要分为“公司快览”“风险扫描”和“财报审核”三大模块，具体应用于“快速了解公司”“监管风险评价”和“定期报告审核”等多个监管场景。

上交所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该平台主要目标是以监管为导向，多维度、全历史、可视化地展示上市公司信息，提升监管人员对公司情况掌握的深度和广度。结合最新技术手段，对公司动态情况进

行实时分析和智能预警，提高监管人员发现问题与防范风险能力。

“公司快览”模块以监管需求为导向，通过直观简洁的信息导图，以监管档案、关键指标分析、股价与公司大事、股东及关键人员、业务及财务信息、行业比较分析、资本运作信息、外部评价信息、公司关系图谱等九大细分板块，多维度、有针对性地刻画公司特征，帮助监管人员快速了解公司的前世今生，穿透识别潜在关联方，迅速聚焦监管相关重点事项。底层数据目前已涵盖44万条任职信息、200余万条持股信息。

“风险扫描”模块从财务业绩风险、经营风险、公司治理及合规风险、股东关键人员风险、资本运作风险、公司债券风险、股价舆情风险等七个维度，设置80个风险标签、160余项触发预警情形的业务规则。

该模块通过科技手段，在实时数据采集、实时数据计算、动态监测风险态势、及时发现预警方面实现长足发展和进步，进一步满足复杂的监管需求。充分预留时间便于监管员作出判断，

上交所试水智能化监管

预估风险，采取有效措施事前防范、事中监管。

“财报审核”模块从财务舞弊动机出发，通过资产质量、盈利情况等角度，构建包括78个标签、200余项预警规则的指标库，初步实现对公司定期报告的自动审查，以帮助监管人员在大量财报信息中迅速锁定隐藏风险，解放审核过程中的人力物力，提升监管效能。

上交所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经对2018年年报审核情况的检验，系统自动生成的审核简报对当期年报审核问询函问题的覆盖率达近60%。

共筑开放式科技监管体系

“这个系统最大的特色是嵌入更多监管逻辑，包括一些数据，都根据监管需求进行梳理。”上交所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比如，在“风险扫描”模块，上交所根据日常监管具体需求，按重要性和时效性等级，对不同级别和类型风险设置不同的预警标识，分为持续提示和快速反应，体现精准监管思路。在“财报审核”模块中，更多标签是针对公司

监管而设计，同市场普遍使用的证券交易软件相比，针对性更强、效率更高。

公司画像系统不仅可分行业识别公司主要经营、财务状况，而且可对生产相同产品的公司进行精细比较分析。例如，生产酒类的企业虽同属食品饮料行业，但酒又可细分为白酒、啤酒、黄酒等，白酒又可细分为高端白酒、普通白酒。公司画像系统既可将高端白酒企业（如茅台、五粮液等）进行比较，也可将高端白酒企业和低端白酒企业进行比较。不仅如此，公司重大项目按监管要求分门别类，使监管人员对公司了解的深度和广度大大增加。

这些信息在此平台上可与证监系统共享，使用者在符合安全要求的网络中只需用户名密码就可登录。

“公司画像平台目前在监管系统内部共享使用，我们计划在系统成熟后可共享给上市公司等需求者共同使用。”前述相关负责人介绍，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打造开放式科技监管体系，让市场各方都能参与到上市公司监管中。

经济学家建议设立扶贫脱贫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多位经济学家表示，打赢脱贫攻坚战，应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对症下药，靶向治疗。达到脱贫目标后，应采取措施巩固脱贫成果，建立扶贫脱贫战略“后2020升级版”。

分类施策 坚持精准扶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撰文指出，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可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应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分类施策，重在精准，做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精准扶贫，就是要把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一一分析到位，再配之以对症下药的解决方

案，以必要的财政资金和可以吸引的社会资金保证方案实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表示，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精准扶贫应统筹管理，区别对待，优化结构。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精准扶贫，第一要精准“识”贫。在精准识别过程中精准把握他们贫困的原因，然后在精准上下功夫，实施一策一户一策、甚至一人一策。

动员社会力量 创新扶贫模式

林毅夫认为，要鼓励广大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广泛参与扶贫。2014年，国家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在扶贫日前后组织开展系列活动，以募集资金。建设社会扶贫网，着力打造社会扶贫参与平台。

姚景源表示，要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到脱贫攻坚战中来，包括企业、社会团体和一些慈善机构等。

此外，姚景源说，扶贫要创新模式。开发性扶贫和保障性扶贫应并行并举，也就是说“输

血”和“造血”功能要并重。扶贫不单单给钱给物，更要给产业给就业。产业扶贫也有覆盖不了的地方，比如一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因此，保障性扶贫至关重要，产业扶贫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得靠保障性扶贫。

贾康认为，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开拓的创新理念，给予精准扶贫一个新的助力。

具体措施必须放到精准扶贫这个大的措施设计组合里，形成全套方案。这个全套方案又称作理性的供给管理，直接对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到实践都可以证明PPP模式是一个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再加社会公众群策群力形成的‘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贾康表示。

四方面入手 设计扶贫战略升级版

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看来，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扶贫脱贫也是如此。因此，他建议，探讨建立扶贫脱贫战略“后2020升级版”。

具体而言，蔡昉建议，应从四方面入手。一

是保持政策稳定和可持续，巩固脱贫成果。把握好脱贫与返贫的动态平衡，让脱贫率始终大于返贫率。

二是密切关注和积极应对新的致贫因素。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会形成新的贫困人口来源。另一方面，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老龄化程度在农村比在城市更显严重，相应产生对巩固脱贫成果的严峻挑战。这既需要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中予以考虑，也要求已有扶贫经验和工作机制能够与时俱进。

三是应对风险冲击型贫困现象。农户面对各种风险的脆弱性尤其突出，特别是收入水平接近贫困线的低收入农户，更易受到各种外部冲击。

四是探索长期可持续减贫战略。一种观点把贫困现象区分为绝对类型与相对类型。对于中国“后2020年时期”而言，相对贫困现象会长期存在，而其应对机制与消除绝对贫困的机制不尽相同，需要通过创新实现体制机制的转变。另一种观点主张根据发展阶段或收入水平设立不同的绝对贫困标准。

“朋友圈”不断扩大 外贸舞台更加宽广

（上接A01版）还有专家认为，经贸关系风云突变，最重要的是干好自己的事情。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部主任、研究员赵萍认为，虽然我国已在专利技术申请数量方面连续8年位居世界首位，研发人员数量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但相对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外贸转向“优进优出”，还有很大差距。在技术研发特别是基础学科研发方面，还需有更大投入。应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产品和服务的研发力度，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

深化改革 推进高质量发展

在魏浩看来，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过程中，要继续重视改革与开放。一方面，切实加大各类制度优化、改革的力度和速度，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继续提高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扩大进口，适度提高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企业发展积极性。

打造贸易强国，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一大良方。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的排名由2013年的第96位跃升至2018年的第46位。其中，2018年位列营商环境改善幅度全球前十，首次进入排名前50的经济体之列。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表示，我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很多企业，不过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需补足短板。我国在执行合同、获得电力、开办企业、登记财产等方面排名靠前，而在获得信贷、办理施工、纳税等方面排名比较靠后，在跨境贸易和投资者保护方面有较大改进空间，也是我国今后可以针对性做好的工作。“下大力气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努力改善营商环境，未来五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企业总部的首选地。”

出口固然重要，进口也不可忽视。“在一部分人眼里，出口是赚钱的买卖，进口是花钱的买卖，对进口的重视程度不如出口。”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研究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白明表示，重视发展进口贸易有助于扩大资源优化配置范围。补短板固然离不开对国内资源的整合，但也需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资源优化配置范围。

总体而言，由大变强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营造良好环境，聚集资本、产业、技术、人才等多方面关键要素；要平衡发展，注重出口与进口的协同并进；要积极发展完善“朋友圈”，并以技术作为硬担当，发展特色产品。

不拒来流，方为江海。中国开放大门将越开越大，“朋友圈”将越来越充实，外贸的深度、广度和科技含量也将逐步提升。

（上接A01版）还有专家认为，经贸关系风云突变，最重要的是干好自己的事情。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部主任、研究员赵萍认为，虽然我国已在专利技术申请数量方面连续8年位居世界首位，研发人员数量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但相对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外贸转向“优进优出”，还有很大差距。在技术研发特别是基础学科研发方面，还需有更大投入。应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产品和服务的研发力度，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